

【世说新语】

杂文与“正能量”

杂文之所以背负“恶名”，大概是因为其体裁使然。从古至今，可以归于杂文名下的文章，或是委婉含蓄地讽喻劝诫，或是慷慨激昂地指斥弊端，总之皆具有批评或批判性。而幽默讽刺、嬉笑怒骂，又是许多优秀杂文所具有的特点。若仅是涉及人生世态，或陈腐观念，人们倒是可以读后付之一笑；若是针砭时弊，抑或矛头明显有所指，就会有人为之动怒，为之生恨。这些动怒生恨者，有的找作者的麻烦，赠他一双可以磨炼脚掌的小鞋，或赐他一条冷板凳，让他一直坐到光荣退休；有的则会立规设禁，令“匕首投枪”统统入库，读者能看到的，也就只剩下浮皮挠痒的“老头乐”。

其实，从古至今，杂文虽为某些人所不喜，但却一直是颇受大众欢迎的文学样式。其原因有二：

若论“文艺为人民服务”，杂文这一体裁堪称最为直接。它虽不像小说那样，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

画卷，也不像音乐、绘画等艺术，给人美的享受和心灵的陶冶，但它可以对种种社会弊端，种种阻碍社会进步的陈腐观念，黑暗势力，给予深刻的揭示和有力的批判。优秀的杂文家，无不时时关心民瘼、倾听民声，具有满腔“为人民鼓与呼”的热忱，以及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尽管对于杂文家个体而言，他的声音是微弱的，但作为一个群体，则如同由千百人共同上演的多声部大合唱，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。而诸多杂文汇集起来，则可以对种种社会痼疾起到聚焦的作用，令人警醒，促人反思，同时可以“引起疗救的注意”。不同时期的杂文汇集起来，则可以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，反映出社会的变革。杂文不仅直接为人民服务，而且可以有助于执政者了解民情民意，为制定或修正某项政策提供种种参考，其功用不可小视。

若论“传递正能量”，杂文更是当之无愧的文学体裁之一。人们通常认为，基

调为讴歌一类的文艺作品才是传递正能量，才是“主旋律”，而杂文则着力于批判假恶丑，是在向读者传递“负能量”。其实，歌颂与批判的作品之根本区别是，前者是以通过讴歌颂扬人与事，引导人们应该这么做，后者是揭露批判错误的事物或丑恶现象，警示人们不应该这么做。简而言之，前者在发挥“榜样的力量”，后者在发挥批判的功能。批判不是与歌颂唱对台戏，而是对歌颂所缺乏的功能，起到补充的作用。批评如镜子，能使人照见自己脸上的污点而思洗涤。杂文正是这样的一面镜子，它可以助人识美丑，知善恶，使良知未泯者积极疗病祛疾。有思想、有识见的杂文佳作，可以启迪读者，开启民智，帮助人们提高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分析判断能力，以及对于真假美丑善恶的识别能力。这，难道不是传递正能量？

(转自《人民日报》)

□梅桑榆

慈禧太后喜欢打赏人，只要一高兴，上至朝廷重臣，下到大监宫女，都会赏赐一番。金银珠宝、房产田地，想到什么赏什么，大家想要什么赐什么。久而久之，赏来赏去，还是那几样，慈禧感觉赏得没有新意，受赏的人也不觉得稀罕珍贵。为此，她开始琢磨该赏赐些什么新玩意给众人。

很快，慈禧发现，自己题几个字、画几幅画，作为赏赐物件是个不错的办法。如此打赏，不仅成本特别低，而且效果特别好。大臣们将字画领回家，定会恭恭敬敬供起来，即便死了，

【谈古论今】

慈禧身边的“艺术圈”

□朱麓

其子孙还会将字画作为传家宝珍藏。于是慈禧开始怡情翰墨，学绘花卉，学作擘窠大字，时不时写个富字、寿字，画些松、鹤、灵芝，戳上图章，赏与众人。

慈禧本身无艺术才华，如今半路出家学画习字，其大作始终处于一种初级水平，书法也好，绘画也罢，笔力孱弱稚嫩，毫无生气。但众文武大臣稀罕那个鲜红的大印章，求字画者络绎不绝，慈禧应接不暇，便想找找人进官代笔。1889年，她下诏各省选送女画家入宫，名义上是教她画画，实际上是替她作画。

在入宫的18名“枪手”中，慈禧对一个叫缪嘉惠的女画家钟爱有加，不仅封其为三品女官，年俸白银2800两，还免其跪拜大礼，并赐红翎一顶。缪画家本是云南的一个寡妇，如今圣眷隆盛，很快就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，甚至托人偷偷将画作捎到宫外出售。由于是御用画家，她的画在市场上行情好，价位高，因而赚得盆满钵溢。有了钱就想利生利，缪画家长期围着官场打转，自知投资官市一本万利，便利用各种关系，活动各方资源，为儿子买得内阁中书一官。

慈禧还酷爱听戏，十分宠幸一些京剧名角。一次唱戏毕，慈禧召见杨小楼要进行赏赐，杨叩头说，要求赏赐大幅的福字和寿字。按照惯例，除了上书房和南书房行走，以及内务府大臣，其他人不到二品，不能赐给福字，年龄不到50岁的不能赐给寿字。但慈禧一贯对这些人有求必应，立刻写了好几方福字和寿字赏给杨小楼。

正是由于慈禧宠着惯着，一些人闹出了不少的风雨，惹出了不小的事端。1899年，武昌城里到处纷传，戊戌变法失败后遭慈禧幽禁的光绪皇帝逃出北京到了武昌，准备依靠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势力，东山再起，大干一场。一时间，武汉三镇的大小官绅，怀着各自不同目的，纷纷前往“光绪”下榻的饭店覲见，三跪九叩，献款献物者不绝于门，“光绪”也是来者不拒，送金收金，送银收银，闹得满城风雨。

当然，真正的光绪皇帝还在瀛台面壁思过，冒充光绪的就是平时给慈禧唱戏的一个戏子。这个戏子名叫崇福，其容貌颇似光绪，在伶人中有“假皇上”之称。崇福尽谄官中礼仪，他看到光绪失去自由，与外界信息隔绝，便串通因监守自盗畏罪潜逃的守库太监，窃取官中御用之物，假冒光绪到武昌诈骗发财。幸好张之洞识出破绽，将二人斩首了事，否则真不知假光绪还会闹出什么惊天后果。

看来，慈禧身边的这些人办法很多，路子很广，能量很大，他们之所以“水很深”，无非是源于攀附上了权力，恃宠而骄，鬻宠擅权，继而无法无天。如果他们没权力的眷顾，画家只能画山水，画天画地，戏子也只能唱古唱今，唱神唱鬼，他们画不出龌龊肮脏的权钱买卖，上演不了“日后提拔”的权色交易，更不可能将“俱乐部”变成“组织部”，将“音乐厅”变成“财政厅”。

投稿邮箱：
qlwbzawen@163.com

【生活直击】

“屁股上的市场”也有文化

去日本的中国游客抢购智能马桶盖近似疯狂，直至把货源抢断流儿了。日本的马桶盖到底是什么一种宝贝疙瘩？要知道，中国人的口彩文化中连“背锅”都是忌讳的，如今怎么会把马桶盖这种为下半身服务的器具从异国他乡背了回来，这不犯了大忌吗？

宁愿犯大忌也要背回马桶盖，必然有他的道理，这个道理一定有点硬儿才行。“中国制造”长久以来被贴上了价廉、质劣的标签，这也是我们“种瓜”，“种豆”的收获吧。别以为你当年“山寨”过、劣质过，如今改了，消费者就不计前嫌了。所以，被消费者认可的商品也绝不会像王婆那样一吆喝就给忽悠出去了。

1月27日，有消息证实，“中国游客疯狂抢日本的马桶盖”，外包装上赫然印着“Made in China”，产地竟是杭州下沙。春节前就有导游告诉中国游客：这种智能马桶盖是中国制造的，可游客没人理会，照买不误。

中国人对“日本制造”的崇拜，我想应该源于“三八大盖”，“王八盒子”和日本家电吧。如果日本的商品也有山寨、也有伪劣就不会出现中国游客在日抢购马桶盖、电吹风、剃须刀等日常生活用品了。据中国导游讲，那画面相当有冲击力，至少在日本人看来是如此。有人调侃，抢购日本马桶盖是“屁股决定脑袋”，其实屁股底下也有文化。

事实上，20年前松下公司就将智能马桶盖引入了中国市场，并在杭州设立了生产基地，再返销日本。据松下销售人员介绍，这种产品在日本非常普遍，但中国消费者接触的少些，一旦知道了，加之价格不高，也就出现了抢购热。由此可见这还不光是个产品质量的问



□阮直

漫画/勾犇

题，中国消费者认可了日本马桶盖，还在于它用水洗的方式来拭秽更加卫生，国人也开始关注屁股底下的文明了。可是当初中国的商家说我们有了水冲式的马桶盖，消费者却认为你是“狗长犄角——整羊(洋)事儿”。

中国制造的能力与水平如今全世界都知道，中国人哪能不知道，可你能制造出来不等于能被人们接受。就像手机，即便国产的品牌与苹果、三星不差上下，人们还是愿意多花几倍的钱去“媚外”，没办法，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转得没有那么快，谁也不能“牛不喝水强按头”吧。

这个“屁股上的市场”其实也有文化，我们生产了20多年的智能马桶盖了，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，“方便”之后水洗

在我们这是没有市场的，甚至有不少企业就死于当初生产智能马桶盖。如今文明的人多了，自然接受的人也多了。

消费者的跟风是大众文化的趋同，不光是国人如此，外国人也一样。就像老外买我们的手工艺品，土特产品不也是呈现抢购吗？难道这就不算老外的“崇洋媚外”吗？媚你时，就是你的文化的魅力，“媚外”时就是“崇洋”的俗气，这是歪理了。

一种商品要让消费者完全认识，再到崇拜、迷恋，是个漫长的文化认同过程。只有无数的消费者多次、反复地从境外买回来“中国制造”，感觉“吃亏”了，消费者们才会自觉地接受“中国制造”的“物美价廉”。就比如空调、冰箱、电视机，如今还崇洋媚外的消费者就少多了。

【社会洞察】

我们今天如何“克己复礼”

我是1973年秋天进师范学校读书后，才开始接触儒家经典的。其时正值全国“批林(林彪)批孔”。批判材料说，林彪在他的巢穴毛家湾房子里，挂着条幅“克己复礼”和“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”。所以，我们批得最多最大声的就是“克己复礼”了。

这个时候我读儒家经典，看到的就是孔子和儒家“反动”的一面。但即使今天来看，作为政治理论，儒家确实是为统治阶级着想的。孔子说：“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。”(《孝经》卷九)一为“安上”，二为“治民”，“礼教”是为谁服务的，还要解释吗？

然而，在社会伦理层面，关于“礼”的学说，不论儒道释，“三家”或者说“三教”，都有可取之处，而且，即便在今天看来，可取之处仍然是主要的。

最近我在武汉一家酒店里，看到床头放着一本精装的《礼记》，有白话今译。显然是学西方旅店配置《圣经》。虽然无名氏集体译的水平不高，我还是读得津津有味。

第一章第二节说：“敖(傲)不可长，欲不可从(纵)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。”这就

很精彩。厚厚一本《礼记》，教人在家在外如何应对处之，虽说教的礼节，因为成书时还没有桌椅板凳，人们像日本人在榻榻米上那样常常跪着，有些动作过时了，但基本原则仍然管用。“鸚鵡能言，不离飞鸟；猩猩能言，不离禽兽。今人而无礼，虽能言，不亦禽兽之心乎？”说得真好！

孟子说：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……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达。苟(若)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(若)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”(《孟子》告子篇上)

作为“礼”的起始点，这种“辞让之心”就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善意，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“乐群”的一面。而在中国的儒道佛三教以及基督教等宗教里，都倡导“谦逊”的价值观。这个“谦逊”，“谦”即谦卑、谦和、谦虚；加“逊”，即逊让、辞让、忍让的意思。总的来说，就是“克制自己，以礼待人”，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“克己复礼”。

“礼”是形式，是手段，它的基础和旨归是“仁爱”。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(《论语》八佾篇)意思

是说：“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，讲究礼仪有什么用？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，表演乐舞又有什么用？”可见，仁爱是内核，礼乐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。孔子又说“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可见，在孔子的学说中“仁爱”才是目的。对人有礼貌，本应当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善意，是对社会环境的一种友爱之心。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个人部分的四个词，其一就是“友善”。可见提倡并践行“友善”太重要了！

说“克己复礼”的核心是“仁爱”与“谦逊”，道理其实很简单。试以乘公交车为例：等车、上车要有“逊让”之心，不要挤，不要抢。如果要好人一味避让，可能他就不能按时上班了，这不公平，所以，要按先来后到排队，不许插队，这就是“秩序”，也就是“礼制”。上车之后，让老弱病残孕先落座；见后来者有更需要座位的，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，这便是“仁爱”；受用了人家的让座，对人家的善意应该表达感谢，这是最起码的“知恩图报”……大家都为别人着想，都守秩序，都与人友善，整个社会就显得彬彬有礼，文明和谐了，这就是“礼义之邦”。

□鄧烈山